

編後語

2012年是一個躁動的年份。當世界末日的虛幻預言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引致五花八門的荒誕性躁動之時，中國卻因為諸多大事的發生而陷入了實實在在的躁動。在這一年，諸多關涉到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大事件登上了歷史的舞台，諸如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召開、薄熙來的下台與「重慶模式」的轟然倒塌、釣魚島事件與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勃發、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海內外大爭論、什邡事件與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前景、倫敦奧運會與中國舉國體育體制的存廢等。每一個事件都等待歷史學家去記載，也等待社會科學家去分析。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看起來「無關緊要」，但卻記錄了中華帝國的失敗和衰落。新中國的2012年看起來「頗為重要」，但究竟是記錄了改革偉業的重新起航還是盛世輝煌的落日餘暉，卻有待歷史老人揭開謎底。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對「中國2012」的謎面進行了初步的探究。張鳴的寫作處在十八大之後全民競猜中國將如何「重啟改革議程」的大背景之下。十八大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治宣示，給眾所期盼的「改革」留下伸縮性極大的想像空間。從觀察者的角度，張鳴列舉了三個新班子方便做的事情，即打破國有企業在諸多經濟領域中的壟斷、繼續司法改革、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變革和基層地方長官的直選。這三件事情，都切合習近平所言：「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然而，「籠子」究竟多大，或以甚麼材質編織，依然是伸縮性極大，而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和阻撓以及新政治精英權威的遞減，對籠子的編織增添了不盡的變數。

除了利益與權力的糾葛之外，民情的洶湧也為改革的重啟帶來不確定性。這其中，民族主義成為民情的一種宣洩方式，而釣魚島事件的爆發恰恰為民族主義的宣洩提供了一個適時的出口。在2012年秋中國各地爆發的保釣遊行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不是示威者對日本右翼的怒火，反而是他們對同胞私人財產和人身安全的恣意侵害以及對國內社會不公的民粹式宣洩。任劍濤之文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依然充斥着暴力之舉和暴戾之氣，而如何使之轉型為「憲政愛國主義」，恰恰是中國重啟改革議程中的艱難一環。

以左傾國家主義為制度模式和左傾政治精英為崇拜對象，是民粹主義的行為特徵。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在「毛左派」對「薄熙來事件」的反應中有着充分的展現。即便薄熙來下台了，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籲求也並非如世界潮流般浩浩蕩蕩。張寧之文提示我們，中國現代化的曲折，可能並不僅僅緣於政治精英選錯了道路，也緣於相當一部分「人民」心中的信念。即便「重慶模式」如游宇和雷艷紅之文所示並不一定帶來炫目的經濟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成長，也不妨礙一部分「人民」義無反顧地心嚮往之。